

人在旅途中

劉青峰

2010年7月24日傍晚，我們乘坐的港龍航班在赤鱗角國際機場起飛。隔着舷窗，我俯視這座環抱在山海間的大都市，兩天前它剛經受一場黑色暴雨洗刷，今日又見藍天，現在正隨着落日餘暉漸漸隱沒在暗夜中。一個多小時後，飛機將在台灣桃園機場降落，這是我的目的地。一年半來，除非時間衝突，否則我們會有規律地飛行於港台之間，參加兩個月召開一次的《二十一世紀》編輯室會議。

眼下，香港漸行漸遠，我想起第一次香港之旅。1987年，我們結束了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一年的訪問研究，承蒙方正兄邀請，在回北京途中順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也是在7月盛夏之夜，我們由三藩市飛抵九龍城啟德機場，香港第一印象是燈海眩目的不夜城。此後在香港逗留的一個月，儘管我們的活動只局限於學術文化小圈子，對香港的了解也很表面，但是已可以說，香港一個月給我的震撼遠大於美國的一年。這種震撼，不僅是因為親眼看到香港經濟之繁榮，言論空間之自由，辦事效率之高，市民之遵紀守法，學者研究之專業與國際化，更主要是有感於中國人的多元社會，令我突然警覺到自己精神上的盲區，這就是我們從小到大潛藏在意識深處的那種中原、京師中心的傲慢心態，它是何等的無知和短視。於是，我們與新結交的香港學界朋友開始商量如何利用香港做點文化事業，譬如，辦一個集合兩岸三地學者視野的出版社。當時說甚麼也沒有想到，不到兩年後，這一心願竟然以絕對超出我們想像力的方式實現了。

1989年4月2日，我們由北京中國科學院再次到香港中文大學，開始了為期五個月的訪問。不到半個月，耀邦先生病逝，引發了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這一事件也根本改變了我們後半生的命運。為延續1980年代的文化理想，我們和方正兄、耀基兄等朋友一起創辦《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雜誌，並由我主編了整整一百期，直到2007年3月我正式卸任、由顧昕接手主編之職。之後，我以半退休狀態參與未完成的課題計劃和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2008年9月觀濤由中大退休到台灣政治大學任教，我在安排好諸多私人事務後，也於次年3月底移居台北木柵。回想起來，無論是長居香港工作生活二十年，還是來台北教書，最初都不是我們的自主選擇，可以說是命運，是偶然，更恰當地說，是緣份。就這樣，隨風飄流吧，我們由中國的中心飄到邊緣、再邊緣，也由青壯年開始進入老年。

在退休晚宴答謝中，我曾這樣說自己：「在香港這個借來的城市，在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借來的辦公室中，一坐就是十八年，直到退休。」短短一句話用了兩個「借」字，似乎我還沒有真正認同香港和中大。其實，香港早已大大改變了我。來台灣後，在不同場合，當有人冠以「大陸著名學者」介紹我們時，我總會小聲接上一句：我們該算是香港學者了吧？就在我們居港這二十年中，中國大陸的面貌變化太大、也太快，社會風氣、心態也早已丕變，記憶中的城市消失了，再難以重溫舊夢；學界、思想界新人輩出，派系紛爭，我們與新老朋友談話聊天，句句都懂，卻往往摸不清究理，如此，我們又何能以大陸學者自命？也許，還可以把我們歸為中國大陸「1980年代」遺老。但是，「1980年代」本身已被掏空為一個符號，任由不同思想立場的人以似是而非的內容去填充它，為己所用，令其面目模糊難辨。在大陸和香港，我們似乎都成為精神上的異鄉人。退休來到台灣，正在進入另一個我們不熟悉、但又很願意了解的華人社會。

觀濤比我豪氣。六十歲時宣稱這是我們人生第三個三十年的開始，台灣教學之餘，他在醫學哲學、中國思想與繪畫關係等方面又開始了新探索。我比觀濤隨意，來台後再沒有出刊、編書、組織會議、完成課題的工作壓力，每天讀書、閱報、寫作。我也常常隨觀濤來往於台北、杭州，享受與兩地年輕學生一起研討文史和美術這兩個不相涉領域中不同問題的樂趣。在台灣，元旦、春節去朋友家作客，花季去陽明山賞花，4月、5月去花蓮看海、看潭，去苗栗看山、看雲，處處是友善和美景。而每當讀書讀不進去、寫作又失語時，我便由着興之所致，塗鴉畫畫，樂在其中。

機長通報即將抵達桃園機場之聲響起，我再次俯瞰黑色地面上被筆直的道路、橋樑兩旁燈光分隔着的城市燈海，那是台北，應該也有我們現居木柵的燈火吧？人在旅途中，我想，不同的飛行目的地，不正好對應着人生階段的變化嗎？那麼，我的下一個目的地在哪裏？

又是夜航。我想起年輕時就很愛看的兩本書，兩位作者都是飛行員，一本是法國聖埃克絮佩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的《夜航》(Vol de nuit)，另一本是美國貝奇 (Richard Bach) 的《海鷗喬納森》(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在惡劣的氣候下，在未知的山地條件中，在沒有領航的黑夜裏，飛行員追求着刷新飛行紀錄，追求可以更清楚看到在地面上看不清的大地輪廓和道路；海鷗喬納森從不理會同類的嘲笑，只跟自己比，追求不斷提高自己的飛行技巧和高度。三十多年了，與觀濤結伴而行，由生於斯長於斯的大陸，而後是長期工作生活的香港，現在是台北，居無定點，常在旅途中。不變的是，我們年輕時就養成了傍晚散步的習慣。在香港，頭十年是在中大校園散步，後十年是在馬鞍山海濱散步，現在，則是在台北木柵景美溪邊河堤、草坪散步。不論是在大陸、香港或台北，我們散步討論的中心問題沒有變，即那些在我們年輕時代就已進入心中、但始終沒有答案的問題。只不過隨着年紀漸老，散步時我常常會默唸尊敬的美國學者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那句動人心弦的話：「在暮色蒼茫中匆匆向前趕路」。

劉青峰 《二十一世紀》創刊編輯